



# 海河流水映风华

李治邦



天津的海河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河流中也许并不出众,但海河却给天津的城市定位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常说九河下梢汇聚在海河,这里所说的九河下梢,确切地说应该是五河下梢,即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最后汇集在三岔河口,汇入海河,之后通向渤海湾。海河不是一条直通的河流,而是弯弯曲曲的,天津这座城市几乎都是围绕着它在“流动”。它的每一次转弯都是一道风景,特别是津湾广场那条美丽的大弧线,勾勒出海河的气派和恢宏。天津城就是这样以海河为走向,建筑大都依着它而建,百姓都依着它而生。

我是喝海河水长大的天津人,从孩提时起,我就爱在海河两岸行走。在我的眼中,海河给天津带来的更多的是容纳百川的胸怀,还有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幽默风趣的语言表现。我看过一张海河的老照片,海河两岸的码头桅杆如林,足有几十个,大船小舟从这里出发,驶向全国各地。特别要说大运河,从南至北交流着各种商机和文化。天津人见到的外地人多了,很容易和商人们交流沟通,南来北往的人为天津带来了各种新鲜事物,也带来了无数商机,长此以往,就有了天津人好客的文化传统。来自中国南方的文化天津人也会喜欢,东北的文化在这里有传播,外国的文化也能接受。不排外,不起哄,不贪财,不给人家脸色看,没有我是大城市的、凡人不理的心理状态。在天津,过去小巷胡同里的吆喝声就能说明这一点:很多都是河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人过来做生意,所以吆喝的口音也是带着浓重的地方特色。这些吆喝给海河码头带来了各种生意经、买卖道,也给海河增添了一段历史和一份记忆。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和曲艺相声在天津的繁荣发展,也使得天津的曲艺文化独具特色。现在天津的相声和曲艺园子有几十家。在古文化街走一走就会发现,有好多相声园子,我在名流茶馆看到连台上都坐着观众。马三立、骆玉笙、王毓文、李润杰、常宝霆等,是全国曲艺界的知名人物,也是响当当的天津文化品牌。说起海河边的古文化街,“非遗”项目就有几十种,吃的玩的看的用的,像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达仁堂,等等。天后宫的正面面对大海,妈祖信俗给海河带来一份吉祥和平安,也给古文化街增添了一抹浓重的中华传统特色。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不是虚传。

不光是这些传统文化,天津的现代音乐也很普及。在海河岸边,不少地方在迷人的夜晚会有露天音乐会,曲声、歌声在海河上荡漾,水鸟在河面掠过

年轻时,以为岭南很远,毕竟岭上的海关在历史上曾经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名气这么大的地方,怎么可能离我等没见过世面的人那么近?后来,到了梅岭,过了海关,才明白海关其实是江西赣州的大余县和广东韶关的南雄市交界的地方,这里也是两地的分水岭,山的那一面,便是岭南了。但是南雄城在哪儿?站在海关,因为没有继续往前,还是不甚了了。

现在,从赣州出发直奔南雄,才知道两座城之间的路程不过160公里。在时间上,比回我老家宁都还要快,更别说赣南其他几个更偏远的县了。时光倒流千百年,先辈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所谓海关,到后来将只剩下纯粹的史学价值、旅游价值;当年得走上多少天的那段路程,现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可抵达,不必再翻山越岭、穿关过隘。

千年前,梅岭北麓的赣南大余县因为区位优势,与赣州为同级行政区,亦是一座地区级的城——南安军治所(后来改称南安府)。而梅岭南麓的南雄,则在南安军成立前几百年,就有了“雄州”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字,当时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乾亨四年(920)。到了北宋开宝四年(971),因为河北有个雄州(今雄县),为了区别二者,岭南的雄州,更名为南雄州。到了宋朝,“州”改为“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1368),南雄由“路”改“府”。清嘉庆十二年(1807),南雄府降为直隶南雄州。在民国时期,南雄为县的建制,直到1996年改为县级市。这就是南雄的“简历”,和许多城市一样,不同的名称与建制的变化,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换在古代,南雄的地理位置和影响力非同一般。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有一首诗《赠南雄某总戎》,开头便说:“秦时南塞此雄州,锁钥凭君控上游。”一针见血地指出南雄在军事上的险要。秦始皇当年曾派大军南下,翻过梅岭,进入南粤,南雄是必经之地。而到了赵佗拥兵自立,建立南越国,定然要派驻兵在此把守。这个时候的南雄,是当之无愧的南方要塞。在古人留下的诗文中想象冷兵器时代的南雄,少不了高峻的城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奇,甚至呼啸的南风中隐约可见金戈铁马。然而,如同大余从州府中心城市成了赣南的一个普通小县,今天的南雄和古代相比,也早已风光不再。我们来到南雄,只能看到一个貌样寻常的县级城市。全市总人口近五十万,城

发出的鸟鸣,与音乐形成了一种动人的和声。夜幕降临,城市的灯火璀璨,流光溢彩,河面被映衬得流光溢彩。我无数次驾车在海河两岸驶过,总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光明而辉煌。游轮在海河上驶过,远远就能听到乐声。乘客们品茗看景,尽情享受海河的魅力。过去,天津人到外地的不是很多,大部分人都愿意享受这份清静和悠闲,都愿意守着这里而生而息。像李叔同这样毅然离开天津出家,后来去福建泉州,做了一名苦行僧的,就显得格外突出。现在,从天津走出去的名人和商人越来越多,我就知道有一个天津大厨在美国开了好几家天津菜馆,热闹一时。远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个著名的天津村,那里的很多天津人至今还操着浓重的天津话,生活方式和饮食也多是天津传统的,早上吃的也是豆腐脑儿和豆浆粽子。

海河两岸的名人故居和历史遗存众多,体现了天津深厚的文化底蕴。李叔同故居就在海河西岸几十米处,前门朝东,后门朝海河。李叔同故居有两尊李叔同大师的雕像,均神情兼备,一座是天津已故著名雕塑家刘鑫的杰作,另一座站立着的李叔同像,是著名雕塑家谭劭劭雕塑的,同样栩栩如生。戏剧家曹禺的故居坐落在意式风情区一个静谧幽雅的小院里,两幢暗黄色意式小洋楼。意式风情区现在焕然一新,特别是附近新建的钟书阁书店,被誉为天津最美的书店。多年前,我在意大利出差时去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听说我们是天津来的,接待的人十分热情,他们说,天津的意式风情区是意大利境外保存相对完整的意式风貌建筑群之一,而且保留的特色十分鲜明。在意式风情区不远处是梁启超、刘霖公、华世奎等文化名人的故居。梁启超的故居如今是一个生动的文化展示场所。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这里担任馆长,见了面就给我讲梁启超鲜为人知的故事。

说起海河沿岸附近的建筑,必须要说一劝业场。曾经,它是天津商界的标志性建筑。劝业场是1928年开业的,是当时全国创新的一种商业建筑,里边吃喝玩乐的设施俱全,创立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我小时候到那里的园子看鼓曲,看一个小时会有人来收费,我就赶紧跑,过一会儿再进来。附近还有中国大戏院,中国大戏院1934年动工,1936年建成。有记载说建成以后是马连良主持开幕典礼的,还加演了《跳加官》,引起很大轰动。京剧的四大名旦都先后到中国大戏院演出过,这里名角云集。当年评剧名家白玉霜演出时,戏票几乎瞬间就售罄。群众艺术馆在十年前曾经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小映霞举办过一场演出,牵线人是小映霞的儿子李家森,演出就在中国大戏院,座无虚席。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小映霞,是晚上十点多压轴登台的,唱的是《李连夺鱼》,那是她83岁告别舞台的一场演出,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不断。中国大戏院真是戏曲界和曲艺界的福地,百年不衰。

此外,当年北洋政府的重要官员袁世凯、冯国璋、曹錕、曹锐、王占元等也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几十年前,我曾经拜访过相声演员冯巩,就在冯国璋故居的地下室,他给我讲起他在相声发展上的志向,眉宇间洋溢着对事业的憧憬。海河两岸的小洋楼里演绎着天津的故事,也是国家的故事,生动而鲜活。天津的金融街就在海河附近,那里遍布着几十家银行。当年盐业银行在陈亦侯把故宫里的16座金编钟藏起来,侥幸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这16座金编钟重470多公斤,当年是薄仪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说起金融街,就要提到利顺德大饭店。利顺德大饭店是1863年建立的,有人曾说,一座利顺德,半部中国近代史。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此居住,孙中山也曾在这里居住过,与革命党人共商大计。一百多年间,很多人进出其间,利顺德大饭店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它见证了天津近代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去年我去利顺德大饭店,坐上那百年老电梯,依旧运行平稳,就像穿越了百年的历史沧桑。

从利顺德大饭店再行一段路,可以到五大道,我当年工作的群众艺术馆就在睦南道东边一隅,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十年之久。有人称五大道是一国建筑博览群,应该名副其实。有不少外地单位的访客到群众艺术馆,都赞不绝口,说我们就生活在“天堂”里。海河边的大悲禅院是天津目前唯一的一座十方丛林寺院,为清代创建,是天津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佛教寺院。望海楼天主教堂也叫圣母得胜堂,也是依着海河而建的。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它孕育了这座城市文化,也见证了这座城的过去与现在。海河是天津城市的坐标,更是研究天津、发展天津的一部教科书。

区面积当然也大不到哪里去。但从街市可以看出,在城乡界限分明的年代,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之前,这座小城是比较繁华热闹的。毕竟长期做过州府治所,城市建设颇有大家气象。就像一个大家人家,再怎么没落,底子依然看得出来。

对这个地方不了解,也没有当地朋友,只能根据网上有限的资料随意闲逛。知道城里有个三影塔,根据导航,很顺利地找到了塔高九层,外面有围墙护着,铁将军把门,无法近身。此塔又名延祥寺塔,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此后经历多次重修。据说,塔建成后,“因立三影堂,其影阴晴俱见于壁间,二影倒悬,一影向

## 秦时南塞此雄州

李伟明

上”,三影塔由此得名。这话说起来很神奇,如今塔旁已无延祥寺,塔影找不到载体,三影奇观也就不复存在了。塔下是城市广场。正值星期天,这里正在举行展销活动,人来人往,一片热闹。冬日的暖阳让人感到特别舒适。人是群居动物,清静可偶尔有之,更多的时间,还是要有人气。尤其对商家来说,人多,才有商机,才有活力,才能看到希望。在城区滨江之滨,看见一处老房子,显示为“广州会馆”。原来,因为地处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要津,南雄和大余一样,在宋代已是商贸重镇,明清时期商贸更加发达。在此经商的广府商人为了方便互相联络,便在这里兴建了广州会馆。这座会馆始建于明朝,此后经过多次重修。每个城市的商业街区几乎都是跟随着“时光流动”的,如今,这里早已不是闹市,门口成了一条略显狭窄的普通道路。久经风雨的会馆从容淡定,似乎在这里默默述说着当年的辉煌。南雄博物馆附近,还留着一座正南门。这座城门始建于北宋

津派文化的独特风骨,素来被学界冠以“雅俗交融”四字。此间的“俗”,是津门街巷的市井烟火,是五方杂处的民生百态;此间的“雅”,是开埠通商后的开阔眼界,是西学东渐的包容胸襟。而津派文化最动人的底色,恰在雅俗之间的相融相生——既深植本土根脉,又敞开怀抱面向世界,而翻译文学作为异质文化落地津沽的桥梁,正是这一文化品格最鲜活的写照,也勾勒出近代翻译思想演进中清晰的“天津脉络”。

谈到中国近代翻译思想,严复是一座绕不开的高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又与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汇编》,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严复开始发表后来轰动一时的译作《天演论》。彼时的天津,已因洋务运动与北洋新政而成为北方的开放前沿,华洋杂居、西学东渐的氛围为严复提供了开阔的视野与思想资源。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首次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此三字看似简洁,却成为中国译学理论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严复将翻译从技术层面的语言转换提升至学理层面的系统思考,奠定了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基石,而从天津的报纸出发,这一思想渐次传及全国,影响了整整几代翻译家与学人。可以说,中国翻译思想走向系统化、学理化的第一步,是在津沽大地上迈出的。

严复以思想译介奠基津门译学,林纾则携手津门译者,让文学翻译走入寻常百姓家。林纾本人不通西文,他晚年最重要的合作者是天津静海人陈家麟,二人以“口授笔述”的方式,合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家经典。林纾以典雅文言传递西洋情感,陈家麟以精准口译保留原著精髓,完美诠释了津门翻译“雅俗共赏、文质兼美”的特质。林纾寓居天津租界时,其翻译心境从怀旧转向务实,更印证了这座城市总能让外来文化与本土精神相融共生,让翻译文学扎根于井、滋养人心的特质。严复之后,天津的翻译血脉并未中断,反而愈发丰沛。李霁野作为早期未名社的重要成员,其翻译活动与天津结缘长达数十年。他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首次完成了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完整汉译。该译本以朴实的语言风格与准确的文本传达,为汉语读者打开了接触西方女性文学经典的大门。李霁野晚年任教于南开大学,始终深耕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翻译,其翻译风格稳健严谨,既坚守文本的忠实性,又注重表达的清晰度,尽显内敛扎实的学术品格。这种翻译取向不仅反映其个人的学术修养,亦可视为津沽文化领域中务实学风的一种映射。

现代天津翻译思想的巅峰,由穆旦(查良铮)抵达。作为生于津门、归于津门的诗人与翻译家,穆旦童年时居住在西北角恒德里,求学南开中学,晚年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在津完成普希金、拜伦、雪莱及

## 瓦罐里的生命温度

卜庆萍



都像瓦罐上的纹路,成了时光里的印记。人生中这些真实的存在并不丑,反倒增添了几分烟火气的温柔和韧性。前几日整理书房,翻出大学时的笔记本。某页空白处,竟画着那只瓦罐,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今天看见卖烤红薯的,铁皮桶里的火苗跳得真暖。要是瓦罐也能烤红薯就好了,一定有阳光的味道。”那是二十岁的我,刚失恋,在冬夜的街头走了很久,看见暖黄的灯光就觉得安稳。现在才明白,当时渴望的哪里是瓦罐烤红薯,分明是在手足无措的时候,想找那个能盛住情绪的容器。

人这一生,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寻找这样的“瓦罐”。可能是一本翻旧的书,可能是一首唱来的歌,也可能是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我们把脆弱装进去,把迷茫装进去,在某个清晨或黄昏打开,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难眠的东西,都已在时光里沉淀成了温柔的颜色。我想起超市里那些锃亮的玻璃罐,好看是好,却少了这样的烟火气。它们太完美了,完美到容不下一点裂纹。可人生哪里有那么完美呢?那些磕磕绊绊,那些起起落落,不正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吗?就像那只瓦罐,因为有了裂纹,才能更好地呼吸,才能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独特的味道。

回家后,我把曾摆在老家阁楼里的瓦罐放在阳台的花架上。种了几株多肉在里面,看着它们在裂纹旁慢慢舒展枝叶,忽然觉得心安。原来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没有伤痕,而是带着伤痕依然能向阳而生;真正的幸福,也不是事事顺遂,而是在经历风雨后,依然能守住心中的那份温暖。

皇祐四年(1052),此后经过数次修复。现在的城墙是前些年修建的,也许地基是以前建的。虽然只是孤零零的一座城门,但也足以提醒人们,想当年,这个地方,是有特殊地位的,它可是“雄州”啊!

城门附近,一座雄伟的廊桥跨河而立。走近看,方知原来这是一座新建的商业综合体。中间是双向四车道的桥面,两边的廊房是高三层的商铺,上面有几座天桥连接两岸。据说,这是广东省首个文旅商业综合体廊桥。“雄州廊桥”的气势倒是出来了,但目前商业还没怎么做起来。这地方眺望江景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夏天,当为纳凉的好去处。

廊桥对面,滨江包围了一个小岛,叫水西岛。驱车上岛转了一圈。这里半是野村半是乡村。已被开发的区域,高楼林立,有多个居民小区。而没有开发的区域,则是常见的农村民房,以及种满香蕉的田地。岛上临水而居的人家,可以随时在门口钓鱼。我们行车经过时,便见到数名悠闲垂钓者。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题南雄驿外小塔》诗:“携家度岭夜乘艇,小泊凌江水北涯。”不知他当时是在凌江哪个位置停船的,估计距离水西岛不会太远。

珠玑巷之外,南雄最有影响的人文看点,是数公里之外的珠玑巷。几年前曾去过一次,印象颇深。珠玑巷其实是一个古村落,被定义为古代中原人翻越梅岭后到达岭南的第一个商业重镇,是广东仅有的宋代古巷古道(有“广东第一巷”之称),是广府人的聚居之地(从这里迁出去的姓氏据说达180多个),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当年从中原南下的先辈们翻过梅岭,进入南粤,在这里定居下来,再继续往南、往东。现在留下的街巷,长1500多米、宽约4米,全程卵石铺就,两旁是传统老民居。初见时,颇感新奇而震撼。近些年看多了古村,这种感觉便没那么明显了。

珠玑巷卖烟丝、板鸭、腊肉等土特产的很多,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息。虽然天气晴好,游客却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多。和前几年相比,旧街区没有什么变化,古巷后面邻近田地之处,则新建了很多姓氏的祠堂,还有一些尚未完工。这种规模的祠堂群,实属少见。看样子,当地是希望通过姓氏文化延伸旅游产业链。这个想法也许不错,但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需要时间和耐心。南雄的“要塞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也许,深挖深耕历史文化,发掘先辈留下的宝贵资源,找准自己的定位,昔日雄州或将换个领域再展雄风。

《唐·璜》等经典译作。他以诗人之笔兼顾意境、韵律与情感,译笔凝练典雅、气韵生动,被公认为现代汉语翻译的高峰。穆旦的翻译,既坚守“信、达、雅”的严译传统,又融入现代诗学创新,将西方诗歌的哲思与汉语韵律完美融合,凝练出天津翻译思想“守正创新、诗心相通”的精髓。他与柳无忌、卞之琳等学人共同构筑“诗人译诗”的津门流派,让天津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翻译重镇。

杨宪益与天津的渊源同样深厚,他出生于天津日租界花园街,在租界文化与本土市井传统交织的环境中长大,后来他与英国妻子戴乃迭合作,把《离骚》《红楼梦》等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晚年回忆往事时,他常常提起天津日租界的院落、街巷里的吆喝,那些童年的声响与他日后笔下的古典中国仿佛有着某种隐秘的相通。此外,朱维之、金陵等翻译家亦在天津留下了深刻的足迹。朱维之“交汇融合,兼谈‘二希’”的学术追求,金陵挑战《尤利西斯》这一“天书”的翻译勇气,都为天津的翻译谱系增添了丰富的维度。

一众翻译大家涌现于天津,绝非偶然,其背后是这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化土壤与制度支撑。从教育层面来看,天津开埠后,教会办学与官办新式学堂并兴,为西学传播铺平了道路。北洋大学堂、南开学校等机构,不仅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更营造了中西学术对话的氛围。到了20世纪中叶,南开大学已成为翻译教学与研究的重镇,李霁野、朱维之等长期在此执教,薪火相传。

从报刊方面来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堪称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文艺》等栏目,融合中西文化之精华,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稳定的发表园地与批评空间。与此同时,《益世报》也很注重翻译,梁实秋、柳无忌等名家都曾参与其中。这些报刊的存在,让翻译不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汇入了公共话语的有机整体。进入“新时期”,天津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依然活跃。各类学术机构、专题会议的设立,使天津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阵地,影响延续至今。

天津的翻译思想从未刻意标榜“流派”,却在百年时光中形成了清晰的脉络:以严复为源头,以学贯中西的翻译家为骨干,以城市开放包容的胸襟为土壤,最终汇入中国翻译文学的大河。这些翻译家如同“摆渡人”,将世界的思想与审美引渡到中文语境,而天津则以“雅俗交融”的独特品格,为这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温暖的港湾。这一“天津脉络”也印证了津派文化的本质:它从来不是封闭的自我言说,而是一场与世界持续至今的深度对话。

去酒楼吃饭,友人特意点了道时蔬,笑称此菜是“隐居江湖的养生高手”,有“长寿菜”的美名。这盘勾起我的好奇心,待服务员端菜上桌,才见是一盘清炒马齿苋——翠绿的叶片裹着油光,夹一筷入口,爽滑中带着脆劲,咸鲜里藏着嫩气,瞬间唤醒味蕾,倒似初遇隐世高人,初尝便觉不凡。

马齿苋,是乡间常见的“草莽英雄”,其“五行草”之名名副其实。它匍匐的茎秆如侠客的绑腿,贴地而行自有劲道,绿叶青翠,红梗青翠,黄花低调难掩光华,白根在土中若隐若现,黑籽落土即生。老辈人说,马齿苋是被太阳点化的草。当年十日并出,大地焦枯,天马踏云而过,蹄印处便生出此草,叶中储水,茎能耐旱,救了万生民。传说,后羿射日时,最后一个太阳曾藏在它的茎叶下避险,事后赐它“不死之身”——即便连根拔起暴晒三日,遇雨仍能重生开花。

在“江湖”医案里,马齿苋是救急救命的“隐侠”。据说,唐时宰相武元衡在四川时,腿上生了毒疮,随行李大夫都束手无策,危急关头,一个无名小吏捧着一把马齿苋赶来,捣烂了敷在疮口上,数日过后,毒疮竟痊愈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它可治“疔疮疔毒”。这模样,多像武侠小说里隐居山林的神医,平时不起眼,遇着危难便挺身而出,用一身本事救人于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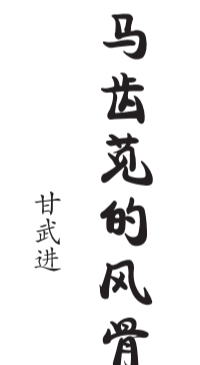
小时候,我也受过它的“侠义相助”。那年在菜园里追蝴蝶,不小心撞了马蜂窝,被马蜂蜇了,手背肿得像馒头。母亲见状,从菜地角落揪了把马齿苋,捣成糊状,往我手背上一贴,肿痛竟慢慢消了。还有一次,我得了痢疾,母亲又去采了马齿苋,洗净捣成泥,用白布包着拧出汁水,煮开了给我喝。喝了三次,痢疾就好了。那时我才知道,这看似普通的野草,竟是藏在身边的“救命侠客”。

江南端午,马齿苋常与艾草、菖蒲组队,于门楣布“五行锁毒阵”。在贵州,据说很多苗族人采食马齿苋,都会对着马齿苋念《谢地母歌》。这份敬畏,是对草木侠心的尊崇,亦是对侠义的感恩。古时,有士大夫认为吃马齿苋是“落难之举”,唯有避世的隐士,才能坦然吃下这“草莽之物”。可陆游游不这么想,他隐居山野时,每日煮马齿苋做羹,还写下“日高羹马齿,霜冷捣鸡栖”的诗句。日上三竿,就着米粥喝马齿苋羹;霜气渐浓,便坐着简陋的“鸡栖车”漫步山间。这份不恋功名、自得其乐的洒脱,倒和马齿苋的“侠客脾性”很像——不管别人怎么看,只管活出属于自己的风骨。

暮色四合时,去田埂上采一把马齿苋,指尖沾着泥土的腥气,倒像触到了“江湖”的脉动。这不起眼的野草,藏着太阳的馈赠,载着医家的仁心,裹着百姓的烟火。它没有宝剑骏马,却用一身筋骨对抗风雨;不曾笑傲江湖,却用点滴绿意温暖人间。所谓侠客,或大抵便是如此——于平凡处见不凡,于卑微中显风骨。就像这生生不息的马齿苋,在田埂间、石缝里,默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江湖”传奇。



沽上丛话



马齿苋的风骨 甘武进

# 满庭芳